

犹太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桑巴特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印证与发展

刘玉瑶

[摘 要] 桑巴特与马克思从不同的路径出发研究了犹太人这一特殊群体。桑巴特希望探究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以及犹太人为何具备现代资本主义才能。他从16世纪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中发现端倪,并运用丰富的史料指出犹太人在国际贸易、殖民扩张、现代国家、股票市场、经济理性主义观念的建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桑巴特将这些贡献归结为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宗教和民族性的影响。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落脚在犹太人的解放上,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犹太人的精神特质及其对市民社会的影响。桑巴特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可以视为对马克思观点的补充和发展。

[关键词] 犹太人;资本主义;犹太精神;解放

[中图分类号] B0-0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极负盛名的、与马克思渊源颇深的德国经济学家,也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给予了他较高的评价:“韦尔纳·桑巴特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总的说来作了出色的描述。第一次由一位德国大学教授,做到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体上看出马克思真正说的是什么,声称对马克思体系的评论不应当是反驳……而只应当是进一步的发展。”^①桑巴特也曾将自己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成果——《现代资本主义》——视为《资本论》的一个续篇。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桑巴特偶然发现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并于1911年出版了《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巧合的是,马克思在1843年就曾写作《论犹太人问题》,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同时,论述了犹太人如何获得解放。二人的切入点 and 指向虽然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两篇文本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为我们了解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提供了钥匙。

一、犹太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贡献

桑巴特力图探寻犹太人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形成中究竟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他为此找到的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012页。

入点是,研究标志着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其最初的形式是否是犹太人所赋予的”^①。这样一来,研究的历史时段便主要放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幼年期,即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其现代形态的时期。

首先,犹太人与16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5世纪以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诸国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16世纪末荷兰资本主义产生了跳跃式的发展,此后法国和英国等西北欧诸国也逐渐取代了南欧几国的领导角色。桑巴特认为,这一重要事实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以往的历史学家将其归因于新航路的开辟或西欧诸国的统一。可是,地中海沿岸诸国在17、18世纪仍然贸易繁盛,且新大陆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掌控;诚然,德意志和意大利没有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但仅从德国的汉堡和法兰克福在17、18世纪的繁荣就能看出,分裂并不必然导致衰败。可见,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为信。桑巴特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线索:犹太人的流徙。15世纪犹太人被逐出了德国的科隆、奥格斯堡等商业城市,15世纪至16世纪末被迫离开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被逐出西西里、那不勒斯、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与这些地区从此一蹶不振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意大利的里窝那、德国的汉堡和法兰克福、法国的马赛和鲁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等城市在成为犹太人的新定居地期间迎来了经济繁荣。这些史实提示了犹太人流徙和国家经济兴衰间的对应关系。

犹太人究竟对现代经济生活做出了怎样重要的贡献?桑巴特将之归结为双重作用:“一方面,他们影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②前一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犹太人编织了国际贸易之网。犹太人所经手的商品量甚大。以德国的贸易中心莱比锡为例,17世纪末以来犹太人在其市场上所占份额呈激增之势。从1776年至1839年,犹太人的数量占基督徒商人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17世纪汉堡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18世纪黎凡特的贸易几乎都由犹太人控制。而这些贸易是世界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犹太人在国际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犹太人所从事的贸易种类多样、涵盖广泛。17—18世纪的金银首饰、珠宝、丝绸等奢侈品,麦子、羊毛、亚麻、蒸馏酒等农产品,18世纪的纺织品、糖和烟草等殖民地产品,棉花、棉制品、靛蓝染料等新兴商品都是犹太人的专营商品。

第二,犹太人是殖民扩张的开拓者。“犹太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③在英国的殖民地南非和澳大利亚,犹太人都开风气之先。犹太人在美洲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使大航海成为可能,哥伦布两次远航的经费依靠犹太人的资助;新世界发现伊始,犹太人就大量涌入,在美洲建立了第一家工厂,圣托马斯岛上的众多糖业加工厂最初就是葡萄牙犹太人建立的。糖产业在几个世纪中是美洲殖民地的经济支柱,也是其宗主国的重要财富来源。桑巴特进一步指出,美国充满了犹太精神。在这里,冶炼托拉斯、烟草托拉斯、电讯托拉斯等都有犹太人的掌控;此外,犹太人创建了许多大型银行;他们主宰了美国的小麦、烟草、棉花贸易三大产业;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给美国带来了现代信贷制度,他们在各州的定居地都扮演着商人的角色。

第三,犹太人支持了现代国家的建立。犹太人一方面作为军需供应商支持了各国的军队建设,进而为新兴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作为理财专家为君主提供日常的财政支持。在英国,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所罗门·梅迪纳都是有名的军需商;在美国,犹太人为独立战

①②③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第6页;第20页;第26页。

争和南北战争提供了军需。而在日常财政支持方面，早在中世纪，“各个地方的税务、盐矿和皇家领地，都由犹太人承揽打理。犹太人担任皇家司库和放债人”^①。进入现代，犹太人借助其王公理财专家的身份，影响了欧洲诸国的财政。例如，17—18 世纪，犹太人金融寡头掌管了荷兰的财政；此一时期，英国议会的货币需求吸引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富有的犹太人来此定居；几乎同一时期，犹太人抵达德国，以“宫廷犹太人”著称；19 世纪，犹太人真正在法国金融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可以说，“犹太人和统治者并肩走过历史学家所谓的现代”^②。

第四，犹太人发明了现代信贷工具并主导了股票市场。可背书汇票首先于 17 世纪在荷兰得到法律承认，而它在威尼斯的使用从犹太人始。17 世纪，阿姆斯特丹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汉堡银行的建立，都有犹太人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股票投机也是犹太人的专长。1698 年法国驻海牙大使写给本国政府的报告显示：犹太人主导了荷兰的股票交易活动。18 世纪，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中心，要归功于犹太人的迁入。19 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扩张意味着犹太人统治了证券市场，他们甚至能影响到各国财政部门的存亡。自此，股票市场日渐国际化，“创造需求”也成为股票交易所的口号。桑巴特认为，“股份制银行的股票交易活动已经日渐成为经济生活中各个部门的控制力量。实际上，产业领域中所有的企业活动，现在都由金融力量决定”^③。

犹太人不仅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结构，而且是现代经济观念的源头。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经济理性主义等观念，是广为人知的现代经济观。而这种观念与早期基督教世界的观念有着鲜明对比。赚取利润是不道德，个人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固定的地点，鄙视引走他人客户的行为，不允许做广告，压价销售令人不齿，更重要的是，生产是为了消费……这些是稳定而缓慢的传统社会的特色。犹太人搅动了这一切，他们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获取利润是目的本身；他们不似行会制度那样注重行业界限，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向各行各业扩张；他们利用叫卖、广告等方式追逐消费者，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他们借助消息灵通或技术革新等优势，千方百计地低价销售，也乐于薄利多销。总之，犹太人“只看重与商品有关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获取利润的内在趋势，已经在早期的创始阶段显露出端倪”^④。在桑巴特看来，“让犹太人区别于基督徒的，不是他们‘放高利贷’，不是追逐利润，也不是大量积累财富，而是他们公开地做这些事情，却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是他们一丝不苟且冷酷无情地关注自己的商业利益”^⑤。换言之，犹太商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根本差别，不在于经济行为，而是上述这些经济观念。有此观念，方有现代经济结构的塑造。

二、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才能

桑巴特认为，犹太人之所以天赋异禀，或者说，能成为现代经济结构的塑造者和经济原则的引领者，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身处的外部环境，二是其民族特性。前者是客观因素，后者是主观因素，缺一不可。

大流散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大流散使犹太人建立了分布于全世界的家族企业。先是第一次流亡时代，然后是 15 世纪末开始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规模排犹，犹太人流浪到世界各地。由此，“同一家族衍生出很多旁支，在不同的经济中心扎根定居，并建立了在

①②③④⑤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第 47 页；第 43 页；第 97 页；第 132 页；第 119 页。

世界各地拥有无数分支机构的世界著名企业”^①。相比于基督徒企业，犹太人一开始就分布在国际贸易或借贷的中心地，家族之间信息共享。人脉广泛和消息灵通，使他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无往不胜；其次，大流散反而帮助他们取得了皇室信任。桑巴特概括道：犹太人成为金融寡头的历程几乎都是从皇室翻译家起步，逐渐作为中间人交涉于各国宫廷，此后成为皇室理财专家，“从这里起步，他很快就掌握了国家财政，并在几年后控制了股票交易所”^②。

外来者和半公民的身份强化了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西欧诸国来说，犹太人几乎都被视为移民或外来者。这种身份使他们不得不快速适应环境，必须善于观察、谨言慎行，全身心投入事业中以寻求立足点。作为半公民，犹太人被限制参与公共生活。这种限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虽然各国法律对犹太人的限制有所不同，犹太人也能找到规避法规的方式，但自身的政治权利毕竟是不稳固的。因此，这种挫折使犹太人被迫将全副精力投入产业和生意中，以金钱的势力赢得权力。另一方面，半公民身份也使犹太人超越国家和党派之争，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表。甚至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是他们获利的主要来源，可以毫无顾忌地服务于不同的政治势力。

犹太人的大量财富支持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桑巴特首先反驳了一种成见，即认为犹太人大多数都是穷人。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犹太人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这种状况持续到桑巴特写作的年代，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掌握巨大财富的犹太人，足以影响国家的兴衰。犹太人随着大流散转移了贵金属，西班牙和葡萄牙没落，荷兰和英国崛起。桑巴特进一步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货币借贷的产物。”^③货币借贷典型地表现了资本主义重量不重质的核心特征。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得以出现，也首先需要初始资金。而最能拿出这笔资金的，当属一直从事借贷活动、充当“君主们的银行家”的犹太人。他们“口袋厚实”，易于“建立银行、仓库以及开展证券经纪业务”，“手上拥有能够放贷的货币”^④，由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铺平了道路。

单有客观环境还无法解释犹太人的经济作用。犹太宗教居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之间，被认为对促进犹太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旧约》《塔木德》是犹太人的经典，其中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主导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犹太宗教没有神秘性，主张征服自然，甚至带有理性主义的性质；在犹太教的典籍中，赚钱并非不道德的，财富反而被视为神的福佑；更进一步，犹太教不拒斥尘世生活，“基督教将自己的皈依者变成了僧侣，犹太教让自己的皈依者成为理性主义者”^⑤。最后，犹太教的律法“迫使犹太人与外邦人隔离居住”，因为犹太人“觉得自己比身边的普通人优越。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一个祭司的民族”^⑥。因此，犹太人往往自成一体，相互抱团。其典籍中提出，借钱给兄弟不可取利息，对于外邦人则没有限制，为经济自由铺平了道路。虽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前，桑巴特大胆提出：清教和犹太教之间存在如此多基本相同的特性，以至于从许多证据中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清教就是犹太教”^⑦，“清教教义是从犹太教义演绎而来的”^⑧。

犹太人所以能做出非凡的经济贡献，离不开主观因素。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迫害，并不必然造就经济生活上的成功。既然如此，犹太人必定有一些卓越的素质。桑巴特将考察对象限定在15世纪末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身上。即便犹太人受到不同人群的同化，即便有不同国度的差异，他们依然具备犹太人的共同特征。首先，犹太人智力超群，这和他们重视学习和智识的传统有关，犹太人也更崇尚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所以他们精于计算，抽象思维能力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第153页；第156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05页；第217页；第227页；第228页。

强，也因此远离具象事物和感性，缺少有机观和整体视野，概言之，他们是理性主义者；犹太人是目的论者，既目标明确、精力旺盛，又由于务实而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他想成为德国人，他就是德国人，如果成为意大利人于他更为有利，他就是意大利人。他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都涉猎，也做什么都能成功……正是因为他的理性，犹太人才能够置身事外看待一切事物。”^①而资本主义体系所要求的，正是高度理智，单调的同质性，目的性。所以，犹太人的特质使他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契合。

桑巴特将这些内在特质的起源归结为犹太人的民族性。总的来说，他认为犹太人的特质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东西，而非教育的产物。首先，犹太族群是一个种族实体，可以称之为“沙漠民族”或“沙漠边缘民族”^②。从人类学的视角看，“犹太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种族的纯洁性”^③，因为他们隔离生活，不与外族人通婚，故遗传特征越发明显；皈依犹太教的异族人极少；其次，犹太人经济活动也证明了其特质的恒定性。犹太人自古代以色列开始就有高度发达的放债行业，上层阶级也因放债而致富。后来，“犹太人首次出现在西欧的历史舞台上，就是放债人的角色”，“放债是犹太经济史中的主要因素”^④。桑巴特在犹太教的典籍《塔木德》中发现，这里有成熟的信贷观念和机制。

沙漠和流走影响了犹太人的特质，货币和宗教婚配制度形成了犹太精神的补充力量。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伯来人找到了自己的落脚之处：栖息地“位于这个星球西方的阿特拉斯山脉和东方的波斯湾之间”^⑤，这是个沙漠地带，农业也是依靠人工手段聚集土壤的绿洲耕作。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身上依旧保持着“游牧性”或“撒哈拉性”。这个沙漠游牧民族在五百年定居之后，分散到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作为商人谋生，只有极少数的人投身农业。与之相反，北方人群所生活的环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他们扎根于土地，生活舒适。在农耕生活下，生产是为了消费，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作。而永远的不安全感、经常性的变动是游牧生活的特征，这是一种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追求获利，无限生产的概念，牧羊人抽象的商品数量概念，计数的需要等，这一切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前驱”^⑥。此外，货币与犹太人不断流走的生活相适应，隔都生活强化了犹太人的内在特质，近亲婚配也使犹太人的遗传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些民族特点，赋予并保持了犹太人的内在特质。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就是“犹太人（推进到北方的南方民族）与土生土长的北方部落融合的结果。犹太人奉献出了非凡的商业能力，而北方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奉献出了同样非凡的技术发明能力”^⑦。

三、从犹太精神的视角看《论犹太人问题》

桑巴特以丰富的史料证明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非同寻常的渊源。而马克思也曾涉足犹太人问题这一领域。以往学界多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或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视角看《论犹太人问题》，其实马克思关于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也是这一名篇中核心而至关重要的部分。在这里，有几个与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相类似的重要观点，虽然马克思是以更简练得多的方式提出的。马克思的几层观点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神，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犹太精神。马克思在反对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神学提法时，首先明确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在此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

①②③④⑤⑥⑦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第247—248页；第262页；第265页；第285—286页；第299页；第315页；第298页。

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①他引用汉密尔顿对受犹太精神影响的美国人的描述:“在他们眼里,尘世无非是个交易所,而且他们确信,在这尘世间,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而外,没有别的使命。经商牟利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变换所经营的货品,是他们唯一的休息。”^②可见,犹太人具备经商牟利的特殊才能,也热衷于此,获取金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

第二,犹太精神已经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基督教的精神。犹太人不仅成功地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让金钱成为世界势力,并成功渗入到基督教中。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也成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同时,“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③。因此,例如在北美,会出现这种现象:基督教的教职和教会活动也沦为商品,有的商人经商失败后去做传教士,有的传教士手里积攒钱财后转而经商牟利、不再布道福音。这就导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思想升华,犹太教是基督教的鄙俗的功利应用”^④。基督教的唯灵论外衣下包裹着犹太教的实在性和粗陋性,犹太精神统治了基督教乃至整个市民社会。这不难使我们想起桑巴特一番考察后的感慨:清教就是犹太教。

第三,政治成为金钱势力的奴隶。马克思引用鲍威尔的观点,“例如在维也纳只不过是被人宽容的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决定着欧洲的命运”,并评价道:“这并不是个别的事实”^⑤。既然金钱已经通过犹太人成为世界势力,那么很显然,没有政治权利的犹太人事实上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马克思对此概括为:“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上一以贯之的观点: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里的市民社会,或许可以替换为犹太精神。

第四,金钱的统治现在成为使人不可忍受的事实。金钱贬低了人所尊奉的一切神的价值,成为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不仅如此,由于“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⑦。在人的世界中,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都同人相异化;在自然界方面,市民社会的自然观表现为对自然界的蔑视和贬低。马克思引用托马斯·闵采尔的话:“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并认为“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⑧,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

第五,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也是犹太人自身的解放。犹太精神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⑨。实际需要的世界和世界观,按其本性来说都是狭隘的。犹太人的解放最后归结为“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⑩。只有当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活动及其前提,也即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时,犹太精神才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空气中自行消失,否则不能奢谈犹太人的解放。

总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简明而深刻地描绘了犹太精神——它的现状、问题和解放途径,对桑巴特并未论及的犹太人解放问题给出了思路。其中部分观点已经为桑巴特后来的细致研究所证实,另一部分则是桑巴特在半个多世纪后也未能企及的高度。桑巴特与马克思论犹太人的内容放在一起,完整地勾勒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联系,以及犹太人和解放的前景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王超)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9页;第50页;第50页;第54页;第50页;第51页;第52页;第52页;第53页;第55页。